

Risk and Prevention
of Stagflation

经济滞胀 风险及其预防

胡健敏 曾令秋 著



科学出版社

经济滞胀风险及其预防

胡健敏 曾令秋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对投资、消费、出口传统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相对应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现状分析,判断我国经济增速与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探讨总需求结构失衡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对近一轮通货膨胀成因及结构分析,归纳通货膨胀潜在风险,探讨供给冲击对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本书基于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等学者对生产与消费、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间供需关系判断,以及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启示,结合我国总需求与总供给变动趋势,由此得出可能产生滞胀风险的成因与机理。

本书可供经济学相关专业研究人士及相关读者参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滞胀风险及其预防 / 胡健敏, 曾令秋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03-050853-9

I. ①经… II. ①胡… ②曾… III. ①通货膨胀-风险管理-研究
IV. ①F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1910 号

责任编辑: 张 展 朱小刚 / 责任校对: 葛茂香

责任印制: 罗 科 /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4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1000)

201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 1/4

字数: 220 千字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长期以来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拉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投资驱动型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同时放缓成为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从出口角度看，我国净出口占比、对外依存度、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与拉动作用均有所降低，出口对 GDP 拉动与贡献作用明显放缓，甚至成为拉低 GDP 增速的主要原因。从投资角度看，制造业、房地产业产能过剩现象较为严重，普遍进入去库存、去产能周期，产品价格下降，债权债务链更为脆弱，企业盈利能力堪忧，投资需求不足。从消费角度看，消费率常年偏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普遍较低，而居民储蓄占其可支配比重普遍较高，在收入分配结构上不仅存在政府与企业对居民的长期挤压，居民内部收入分配不均也极大的抑制了消费能力，消费需求短期难以提振。从出口情况而言，全球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外需乏力，我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低成本、低附加值为特点的传统出口模式难以为继。

本书在借鉴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等学者对供需关系与经济危机成因影响的理论基础上，以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作分析工具，分析得出新常态下投资、消费与出口三大需求共同下滑导致总需求曲线左移这一结论。结合货币供应与价格传导机制对我国近一轮通货膨胀的影响，探讨了可能存在的总供给冲击带来的潜在滞胀风险，认为总供给、总需求变动现状有产生滞胀风险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给出预防滞胀风险的相关政策建议。

本书的出版，是二位作者辛勤工作两年的成果，其背后，饱含数不清的探讨与修改，写作过程中，视求知为享乐，在孤独与安静中成长进步。本书的成型还得益于诸多老师的点拨指导，其无私奉献，良苦用心久久难忘，感激之情难以言尽，无以为报。

滞胀风险及其预防是一项长期而颇有实际意义的议题，是当前关注的焦点与难点，对其解读见仁见智，由于作者学识与能力有限，书中可能存在不足或纰漏之处，热忱欢迎各位读者批判指正。

胡健敏

2017 年 3 月于狮子山旁

目 录

第1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3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4
1.2.1 经济增长相关概念及影响因素	4
1.2.2 通货膨胀相关概念及影响因素	11
1.2.3 滞胀相关概念及可能性判断	17
1.2.4 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趋势	22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30
1.3.1 主要内容	30
1.3.2 主要研究方法	32
1.3.3 研究思路	33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工具	34
2.1 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	34
2.1.1 社会再生产模型	34
2.1.2 生产相对过剩危机产生的原因	35
2.1.3 货币与危机产生	36
2.1.4 利润率机制	37
2.1.5 信用制度	37
2.2 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	38
2.2.1 有效需求的概念	38
2.2.2 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	38
2.2.3 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	39
2.2.4 货币供应对有效需求的影响	40
2.3 弗里德曼经济周期理论	41
2.3.1 现代货币需求论	41
2.3.2 货币供给、货币需求及货币的传导机制	41
2.3.3 货币存量、货币流通速度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42

2.4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44
2.4.1 AD 曲线的斜率及含义	44
2.4.2 AS 曲线的斜率及含义	45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段经济增速放缓期及其成因	48
3.1 第一段经济增速放缓期(1979—1981 年)	48
3.1.1 表现形式及制度背景	48
3.1.2 供需成因及其治理	49
3.2 第二段经济增速放缓期(1988—1990 年)	51
3.2.1 表现形式及制度背景	51
3.2.2 供需成因及其治理	53
3.3 第三段经济增速放缓期(1997—1999 年)	56
3.3.1 表现形式及制度背景	56
3.3.2 供需成因及其治理	57
第4章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原因分析(2010—2015 年)	60
4.1 经济增速与产业结构变动趋势	60
4.1.1 GDP 增速下降	61
4.1.2 农业支撑力度不足	62
4.1.3 工业指标普遍下滑	65
4.1.4 建筑业增速放缓, 占比加重	76
4.1.5 服务业增速放缓, 占比加重	77
4.1.6 就业结构变动, 增速下降	81
4.2 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速放缓影响	85
4.2.1 投资需求放缓	85
4.2.2 消费需求乏力	92
4.2.3 出口动力不足	99
第5章 我国通货膨胀结构分析(2010—2015 年)	103
5.1 近一轮通货膨胀指数走势	103
5.1.1 CPI 变动趋势	103
5.1.2 PPIRM 整体变动趋势	104
5.1.3 PPI 变动趋势	105
5.2 通货膨胀指数主要影响因素	106
5.2.1 CPI 主要影响因素	106
5.2.2 PPIRM 主要影响因素	111
5.2.3 PPI 主要影响因素	113
5.3 近一轮通货膨胀成因及类型分析	115

5.3.1 基于价格传导角度	116
5.3.2 基于货币供应角度	118
5.4 通货膨胀潜在风险	120
5.4.1 房地产价格推高生产生活成本	120
5.4.2 股市泡沫影响通货膨胀预期	121
5.4.3 高额外汇储备带来的流动性压力	123
5.4.4 货币供应增速过快增大通货膨胀压力	125
5.4.5 欧美持续量化宽松政策加大我国通货膨胀风险	127
第6章 新常态下滞胀风险机理分析	129
6.1 新常态下滞胀风险判断	129
6.2 新常态下中国滞胀风险机理	131
6.2.1 为何存在滞的风险	132
6.2.2 为何存在胀的风险	133
6.2.3 为何存在滞胀的风险	134
6.3 基于制度层面的滞胀风险成因分析	136
第7章 美国滞胀诱因及治理对我国的启示	140
7.1 美国滞胀前期特征及诱因分析	140
7.1.1 赤字财政政策隐患	140
7.1.2 超额发行货币	141
7.1.3 以利息率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弊端	142
7.1.4 税负对经济活力的遏制	143
7.1.5 突发事件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144
7.2 里根政府滞胀治理对策	145
7.2.1 削减支出	145
7.2.2 货币政策目标调整为货币供应量	146
7.2.3 利率、汇率保持较高水平	146
7.2.4 税制改革	147
7.2.5 改善就业结构	148
7.3 对我国预防滞胀风险的启示	148
7.3.1 赤字财政是否必然产生通货膨胀	148
7.3.2 减税对缓解滞胀的作用	150
7.3.3 如何缓解结构性失业问题	151
第8章 针对滞胀风险的政策建议	152
8.1 基于经济增长角度	152
8.1.1 优化产业结构, 促经济结构转型	152

8.1.2	推进国企民企双向改革	155
8.1.3	完善失业监测统计制度,推进创业创新体系	157
8.1.4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消费需求	158
8.1.5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	160
8.2	基于通货膨胀角度	162
8.2.1	预防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防范游资炒作农产品	162
8.2.2	审慎使用货币政策,合理调控货币投放力度与流向	163
8.2.3	严控地方债务与外汇储备规模	164
8.3	总结与展望	165
参考文献		166

第 1 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2014 年国民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较 1978 年增长逾 173 倍,人均 GDP 增长 121 倍,国家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既是我国国民总需求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在我国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并存的国民经济背景下,投资驱动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驱动模式。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资源与生产要素配置更为合理,资本与产品流动更为顺畅,出口导向型模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2007 年下半年起,欧美陆续出现因房地产泡沫、资产证券化背景下过量次级按揭导致的次贷危机。当流动性过剩时房价被动影响更大,房地产价格全面陡降冲击金融体系,信用体系层层坍塌,流动性危机波及面越来越广,由此引发了一场从华尔街到欧美再到全球的金融海啸。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之大、程度之深引起各国政府的密切关注与积极应对。作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此轮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也颇为明显,据统计局资料显示,2009 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低 GDP 增速 4.1%,该时期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不仅为 21 世纪以来最严重,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为应对外贸环境恶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2008 年起我国政府迅速制定了以“保”字当先的“保增长”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2008 年底推出以保障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为重点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2009 年货币供应 M1 与 M2 分别较 2008 年增长 32.4%和 27.7%,此次经济刺激计划达到了治标的效果,但其是否治本仍受各方质疑。2010 年起,我国进入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结构亟待调整、经济驱动力有待重塑的新常态时期。从经济增速而言,2010 年二季度至 2015 年二季度 GDP 季度值由 11.7%连续 20 个季度下降至 7%。从三大需求对 GDP 增长的贡献和拉动看,2010 年 GDP 增速为 10.6%,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分别拉高 5%、7%，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拉低 1.4%；2014 年 GDP 增速为 7.4%，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对 GDP 拉高 3.7%、3.6%和 0.1%^①，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有所放缓。与此同时，2010—2012 年我国经历了新一轮通货膨胀周期，以 2010 年国家提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应控制在 103 左右作为当时判断通货膨胀严重性的标准^②，2010 年 7 月起我国 CPI 突破 103 后一路上扬，2011 年 7 月达到峰值(106.5)，随后不断下降，2012 年 5 月起回落至 103 以下。此轮通货膨胀周期与以往相比具有如下特点：周期短，持续时间仅为两年；间隔短，与上一轮通货膨胀(2007—2008 年)仅间隔一年；振幅大，CPI 从峰值(106.5)到谷值(101.8)仅历时一年，是一次较为典型、影响较大的通货膨胀周期。

滞胀(stagflation)，从字面理解是经济停滞(stagnation)与通货膨胀(inflation)并存的一种经济现象，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停滞，并以失业问题加剧等为表象，另一方面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滞胀现象的产生一般与经济、政治的影响有关，如经济周期的变化，国家货币、财政政策决策不当等都会引发滞胀现象。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美国经历了较为明显的滞胀阶段，整个滞胀期持续十余年，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造成重创，通货膨胀增幅两度高达 10%以上，经济发展一度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现象，失业率高居 6%—8%，成为滞胀现象最为沉重也最为深刻的现实诠释。该现状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及其践行者造成极大冲击，面对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这一前所未有的怪象，人们措手不及。滞胀从产生伊始就在大洋彼岸向人们展示了它巨大的破坏力与影响力。滞胀期间，高速上涨的物价干扰了商品市场的供求信息，加重了人们的生活负担。经济长期低迷，持续数年下滑，生产投资几近停滞，企业倒闭数、银行破产数与失业率屡创新高，对美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都造成极大影响。美国滞胀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内生动力而言，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创造力与竞争力已经是强弩之末，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从政府原因而言，长期赤字财政、货币超发、以利息率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税负过重等都是滞胀的潜在诱因，加上美元危机、石油危机、粮食危机及越南战争等突发事件冲击，多方面因素共同构成典型滞胀现象。

鉴于此，本书一方面通过对与投资、消费、出口传统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相对应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现状进行分析，判断我国经济增速与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探讨总需求结构失衡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对近一轮通货膨胀成因及结构进行分析，归纳通货膨胀潜在风险，探讨供给冲击对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综合借鉴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经济周期理

① 数据来源：由 2010—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② 腾讯财经. 2010. 发展改革委回应三大热点：全年 CPI 控制 3%可以实现. <http://finance.qq.com/a/20100915/001757.htm>.

论中对产品、货币供需关系的理解,结合我国总需求与总供给变动趋势及成因,假设我国总需求、总供给变动适用于常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我国是否存在滞胀风险,如何预防滞胀风险。

1.1.2 研究意义

从理论意义看,19世纪20年代英国首次爆发较为典型的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就未曾停止,且呈周期性重演的规律性特征。马克思主义学者与西方经济学者对经济周期的性质、成因及运行机制分别给出了不同的解读。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成为较具代表性的理论体系,二者对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运行中投资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旨在提高有效需求的国家干预理论广受各国政府重视,成为欧美等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产生的滞胀现象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造成极大的负面冲击。学术界对美国长期奉行的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也产生了较深的反思与质疑,以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为代表的经济学派对滞胀现象给出了自己的成因解释与对策建议,主要围绕有效需求理论前提假设是否成立,有效需求不足的解释是否合理,政府应侧重需求管理还是供给管理等方面展开。从里根政府对滞胀治理所采取的措施看,也主要依据供给学派所推崇的减税等政策鼓励投资对付“滞”,以货币学派控制货币总量等主张对付“胀”,利用前者刺激供给,后者控制需求,最终使美国扭转滞胀局面。此后数十年,其他国家或地区时有出现高通胀与低增长并存的滞胀现象,围绕滞胀现象成因及治理对策的理论体系在争鸣中不断丰富,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的研究也不断发展。当前,我国已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增加,市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通过对经济周期、滞胀等相关理论的梳理与解读,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运行趋势及结构特征,借助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剖析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总需求与总供给变动成因及趋势,判断我国是否会出现滞胀风险及应如何预防滞胀风险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从现实意义看,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潜在的通货膨胀风险较大,从理论上解读我国是否存在滞胀风险及如何预防滞胀风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长期以来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投资驱动型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同时放缓成为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从出口角度看,我国净出口占比、对外依存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拉动作用均有所降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出口对GDP的拉动与贡献作用明显放缓,甚至成为拉低GDP增速的主要原因。从投

资角度看,我国制造业、房地产业产能过剩现象较为严重,普遍进入去库存、去产能周期,产品价格下降,债权债务链更为脆弱,企业盈利能力堪忧,投资需求不足。从消费角度看,我国消费率常年偏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普遍较低,而居民储蓄占其可支配比重普遍较高,在收入分配结构上不仅存在政府与企业对居民的长期挤压,居民内部收入分配不均也极大地抑制了消费能力,消费需求短期难以提振。从出口情况而言,全球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外需乏力,我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以低成本、低附加值为特点的传统出口模式难以为继。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不足,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明显放缓。这一轮通货膨胀上升期,经济增速已有所放缓,尽管从经济增速放缓程度和持续时间看,尚不足以成为典型滞胀,但结合近一轮通货膨胀类型及成因分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进口成本冲击较为明显,货币供应增速较高但货币流通速度较低,虚拟经济流动性过于富裕而实体经济流动性明显不足。新常态下,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三大需求动力不足,土地、能源、劳动力、原材料等要素资源日趋稀缺,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潜在的供给冲击不容忽视,加上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成本推动型、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仍明显。在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总需求与总供给矛盾更为凸出,且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风险较大的背景下,通过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滞胀现象的理论梳理,结合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下行趋势与近一轮通货膨胀成因分析,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角度判断哪些原因可能构成滞胀风险、滞胀风险形成的机理及采取何种政策避免滞胀风险等方面的研究显得较为必要也较有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经济增长相关概念及影响因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一段时间内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处理后一个经济体中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表示,且一般会剔除通货膨胀对商品物价的干扰^①。经济增长类型一般分为集约型增长(intensive growth)与粗放型增长(extensive growth),前者指在既定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投入下因为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产生的增长,后者指仅加大要素投入量而产生的增长。一国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速有助于消除贫困,提高劳动生产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力与物质资本集聚,技术进步对生产力的提高被视为

^① Statistics on the Growth of the Glob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from 2003 to 2013, IMF, October 2012.

传统经济增长的源泉,劳动力占总人口比率与劳动力参与率都会影响经济增长。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ian)认为工业革命之前,技术进步更多的是带来人口数量上的增长而非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直到18世纪工业技术革命后某些国家才出现人均收入明显提高的现象,马尔萨斯困境(Malthusian trap)才被打破。当今在部分贫困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仍存在即使技术进步,人均收入水平也未能提高的情况。随着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人口出生率下降,平均寿命增加,更多女性参与工作,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变化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机器、厂房、硬件办公设备、商务用车、建筑设备等物质资本的使用也是经济增长的现实支撑,但物质资本的投入与经济增长并非绝对的线性关系,折旧、利息等因素的存在导致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另外,资本投资、技术驱动、新产品与新服务的诞生都会促进经济增长。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 1963)认为,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可概括为“两个增长、三个恒定(或近似恒定)及一个差距”,即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且增长率不断提高,劳动者人均物质资本持续增长;资本回报率恒定,物质资本—产出比恒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恒定;国家之间,劳动者人均产出增值率差距较大。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较多,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归纳。

1. 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被很多学者视为经济增长模型的起源,马克思所关心的经济增长问题主要为如何实现社会总产品,并从价值上将社会总产品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三个部分,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与剩余价值增加是实现资本增值与经济增长的源泉。无论是两部类模型还是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条件,工人的劳动都是马克思关注的重点。马克思提出劳动生产力(也称作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等)由工人的熟练程度、科技水平及应用情况、生产资料规模及性质、自然资源等决定,涵盖了科学力量、社会力量、从劳动生产力转移到机器生产力的技巧。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单位商品价值量降低,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与剩余价值增加,从而使资本增值,实现经济增长。马克思主义学者还从制度层面剖析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可使资本家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将劳动力与人力资本联系起来,进一步关注除简单劳动外,非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部门经济产出的重要作用。这里人力资本指体现于劳动者身上的生产产品,提供各种智力、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积累指投资、扩充人力资本价值,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式。随着人力资本积累时间变长,人力资本增长率也会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不仅影响个体自身生产率,还会影响社会生产率与整体经济水平。相对于技术、知识

而言,人力资本属于竞争性产品,排他性更强。有学者认为,缺乏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小于缺乏同样数量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影响。舒尔茨(1990)将人力资本视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并将人力资本解释为劳动者的质量和数量。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健康状况等综合体现其人力资本价值。投资人力资本不仅可提高劳动者素质,获得较高的资本投资回报,而且在长期内,可极大促进一国经济增长。西奥多·舒尔茨甚至根据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测算出1929—1957年美国教育产生的人力资本对国民经济增长起到近三分之一的作用。宇泽弘文—卢卡斯模型预测,经济体从摧毁物质资本的战争中恢复得更快,而一旦人力资本被摧毁,恢复速度会更慢。此模型的另一个结论是,如果教育部门属于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教育部门的低工资率会降低教育部门的运营成本,更多的人力资本将从商品生产部门转移到教育部门,经济增长率会降低。卢卡斯、贝克等将人力资本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通过内生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动,提出最优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等相关的生产函数,以解释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卢卡斯(Lucas et al, 1988)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卢卡斯模型中,加总的生产函数和人力资本形成函数为 $y_t = A_t k_t^{\alpha} \mu_t h_t^{1-\alpha}$, $h_t = B(1-\mu_t)^{\beta} h_t$; 其中, h 是人力资本中用于生产的部分, k 代表物质资本, μ 表示用于生产的时间, A 、 B 是正的参数, y 代表产出。卢卡斯将内生化的人力资本引入索洛模型,人力资本进步率代替了技术进步率,认为只有特殊化的、有劳动技能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既可通过学校教学或各种培训获得,也可在实际工作中积累,类似于“干中学”理论。人力资本增值速度直接影响部门经济产出,从总体看,人力资本边际产出递增,可弥补一部分物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限制,保证经济长期增长。在内生增长模型的表述中,重视研发可带来内生技术进步与内生增长,甚至打破其他要素收益递减的约束。只要技术水平能够不断提高,经济增速也会不断提高,只要发明者所得现值不低于研发成本,研发投资就会不断进行。但新产品、新技术的发现是随机的,因此经济增长路径并不是平滑的,间歇性的新发现也会引起整体增长率的变化。经济体越大,平均每单位劳动力发明成本就越低,在规模效应下,新产品可通过非竞争性方式为整个经济体所用,劳动力的增加有助于提高收益率,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

2. 资本与货币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否影响经济增长一直众说纷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背景条件下未有定论。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货币中性理论,即名义货币供应的变化只会影响价格水平,而实际利率、产出、就业水平等变量不受货币影响。具体而言,保持价格水平不变时,名义货币供应的增加会导致实际货币供应增加,LM曲线右移,实际利率降低,产品需求超过充分就业的产出。当厂商因供不应

求提高产品价格时,实际货币供应回到初始,产出仍为充分就业水平,经济回归一般均衡,产品价格却停留在上涨后水平。基于对历史现状的认识与古典模型的反思,人们普遍认为加大货币供应会刺激经济增长,减少货币供应会引致经济衰退,货币量领先或同步于经济周期。绝大部分学者认同货币非中性论,具体又分为两类观点。

(1)短期货币非中性说。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学者对货币是否中性的矛盾分歧主要源于价格变动与经济恢复一般均衡的速度。古典主义假设下,价格可灵活调整,经济可自我调节,货币供应对实际变量的冲击是暂时的,即只在“LM曲线右移,实际利率降低,产品需求超出充分就业的产出”的状态稍作停留。凯恩斯主义学者则认为价格调整是缓慢的,短期内增加货币供应会提高就业与产出,长期内货币才是中性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错觉理论(misperceptions theory),认为生产者有时会将一般性价格水平变化误解为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生产者所选择的产量也取决于真实的一般价格水平与预期的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短期内,总供给曲线向上倾斜,长期内,真实价格与预期价格调整一致时,长期总供给曲线是一条位于充分就业状态的垂直线。卢卡斯和罗伯特(Lucas et al, 1988)在错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假设及相关理论,即短期内生产者将产品名义价格上升误认为是产品相对价格上升,产出增加,货币供应是非中性的。而长期内,人们感受到真实的相对价格水平,意识到生产境况并未好转,产出回至充分就业水平,货币供应是中性的。他认为货币供应与预期相关,未预期到的货币供应会影响产出,而预期到的货币供应变化呈中性。尽管利用人们预期不足,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可出其不意地影响经济运行,但公众中总有一些观察者善于捕捉经济动态,对经济数据进行合理而明智的分析,看透政府调节货币供应的行为模式,具有理性预期假设,因此,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行为结果往往并不如意。尽管如此,未预期到的货币供应变化仍会导致货币非中性,其变化可能是短期冲击,也可能演变为影响存货水平的传导机制(propagation mechanism),对经济增速产生长期影响。

(2)货币非中性说。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安娜·舒瓦茨(Milton Friedman et al, 1963)在合著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中得出货币冲击与经济活动、名义收入、价格等因素息息相关,货币与经济变量间显著相关的结论。对于货币波动的原因,他们认为机构变革、管理者的更替等突发事件比宏观经济变动更有解释力,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劳伦斯·鲍尔等(Laurence Ball, 1988)以美国1960年后实际经验补充支持货币非中性论。实际生活中,货币供应变化似乎确与经济周期息息相关,货币供应增减似乎预示、影响、左右着经济周期荣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之归为“反向因果关系”,即增加货币供应是因为预期到未来产出增长。当政府察觉到货币需求增加时,会增加货币供应保持物价稳定,因此,货币供应既领先于经济增速,又同向于经济增速。

3. 收入与储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现代增长理论起源于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ay, 1928), 拉姆齐所提出的家庭跨期最优化动态均衡分析思路普遍应用于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拉姆齐模型讨论了在完全竞争市场中, 互为影响且追求最优化的居民与企业对消费与储蓄之间的选择。储蓄率可用与人均资本存量相关的函数表示, 居民当前收入提高时, 储蓄是单调下降、保持不变还是单调上升的影响因素很多, 如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作用效果差异、受教育程度、时间偏好率等。哈罗德与多马(Harrod et al, 1942)认为, 经济增速取决于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率, 基于此构建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模型假设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 可用于个人消费或投资, 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 规模收益与技术水平不变。哈罗德与多马所提出的增长模型基本公式是 $G = S/C$, 其中, G 是产量增长率, S 是储蓄与国民收入的占比, 也被称为储蓄率, C 是资本产量比率。此公式表达了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基本条件, 即产量增长所带动的投资正好吸收同期储蓄。当 C 不变时, 若想保持一定的产量增长率 G , 应保持一定规模的储蓄率 S ; 当 S 不变时, 若想保持一定的产量增长率 G , 只有通过提高技术、改变生产方式等降低资本对产出的影响。除了实际的产量增长率, 哈罗德—多马模型还引入了适宜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的概念, 适宜增长率由最适宜的储蓄率与资本产量比率所决定; 自然增长率是长期过程中, 人口增长与科技进步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实际增长率、适宜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三者应协调统一, 即现实状态、理想状态、长期所能达到的最大状态应一致, 否则经济就会出现波动。短期内, 实际增长率大于适宜增长率时, 厂商会加大投资, 经济会扩张, 当实际增长率小于适宜增长率时, 厂商会缩减投资, 经济会收缩。长期内, 当适宜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 即超过了长期过程中人口技术所能承载的最大值时, 经济会出现停滞, 当适宜增长率还未达到自然增长率时, 经济保持繁荣。大部分时间三者是不一致的, 因此市场经济出现充分就业均衡增长的可能性很小, 经济波动是频繁而剧烈的, 资本家的资本投入应尽量使三个增长率保持一致。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 1938), 卡尔多(Kaldor, 1963)等新剑桥代表学者沿着哈罗德与多马的理论构思, 承上启下, 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补充, 得出收入分配失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罗宾逊构建了实现劳动充分就业与资本充分利用时的均衡状态, 提出在既定的资本劳动量比例下, 利润率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水平, 而经济增长率又等于利润率与利润收入者(资本家)储蓄倾向之积的观点。在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下, 资本家的利润率与储蓄倾向呈负相关关系, 随着经济增长, 利润率可能增加, 但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会降低, 因此经济增长波动向前但不会无限制扩张。卡尔多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则从研究收入分配入手, 其基本假定也是围绕收入与储蓄问题展开, 研究对象包括利润收入者(如资本家)与工资收入者(如工人)两个阶级。在

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投资增加总需求增加,产品价格提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提高,实际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降低。帕森奈蒂的经济增长模型延续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与卡尔多模型的思想,其模型也假定只有利润收入者与工资收入者两类,二者储蓄倾向不变,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高于工资收入者,调节储蓄率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其增长公式中 S 分解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 P/Y 与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 S_p 之和,加上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 W/Y 与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 S_w 之和,即 $P/Y + W/Y = 1$, $S_p > S_w$ 且相对固定。储蓄率取决于利润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越大储蓄率越高,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越大储蓄率越低。当资本产量比不变时,应保持一定的储蓄率,利润收入者收入越高越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会加重收入不平等。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一味追求高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国家应通过政策调节收入分配比例,实现收入分配均等化。

4.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古典政治经济学者西斯蒙第(Sismondi, 1964)尚未充分意识到技术进步对人们生产生活的革命性影响,片面地将技术进步归为失业增加与供求失衡的导火索,认为技术进步降低了劳动力与资本比例,尤其降低了低收入者收入与消费需求,经济增长受此影响甚至停滞。然而美国近两个世纪以来人均增长率一直为正的事实反驳了技术水平不变假设下收益递减的观点。马克思在其相关论述中将技术进步纳入社会生产总体考虑,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与生产要素的提高同样促进扩大再生产。在技术进步作用下,尽管劳资比例不变,部门均衡不变,经济也会实现增长。20世纪50年代起,人们逐步认同了技术持续进步的假设条件,由此探讨经济如何实现长期增长。技术进步也被分为不同类型,如能使生产者投入较少资本实现同样产出的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使生产者投入较少劳动力实现同样产出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保持投入要素比相对不变时中性的技术进步。以罗默、巴罗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学者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等内生,构建出新增长模型,并强化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总体而言,新增长理论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基本模型是 $y(t) = ak(t)$, 其中 a 是一个大于零的常数,代表技术系数,技术系数决定了经济增长率。无论是以人力资本为重点的模型还是以技术进步为重点的模型,知识在积累的过程中都具有外部性,且体现于人力或实物中。在技术等要素的作用下,收益呈递增趋势,这也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可以长期实现。

较之新古典模型,罗默(Romer, 1986)所考虑的要素除资本与劳动外还加入人力资本与技术水平,后两者主要以受教育(培训)年限与专利数衡量。罗默模型假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知识生产的私人收益递减但新知识会使社会总体收益递增,知识具有正的外部性。模型强调了研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技术进步内生